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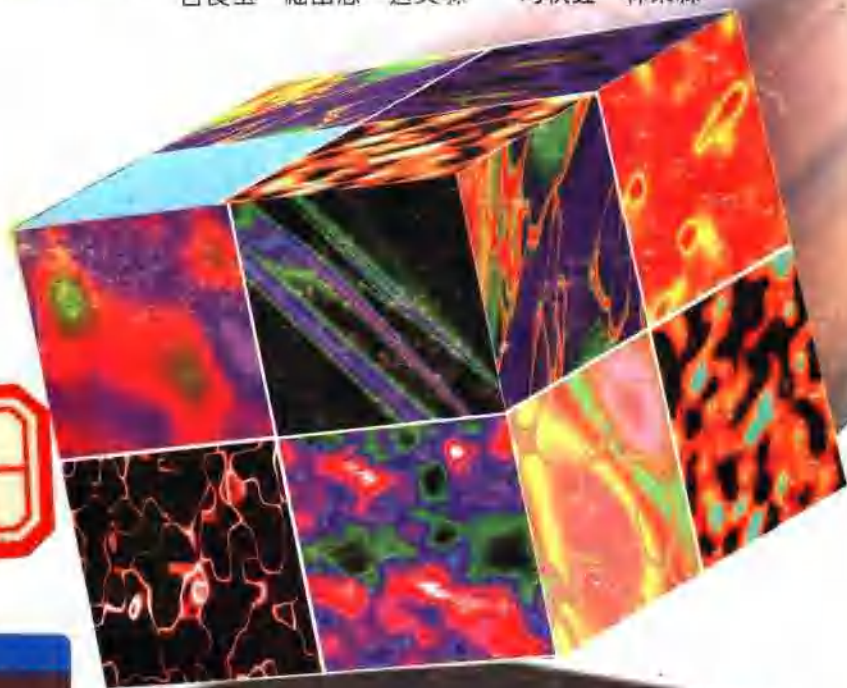


青少年哲学丛书

世界哲学史话

西学东渐——东方近代思想史话

主 编：万 方
副主编：方国荣 汪小洋 许 望
吉良玉 士 水 福田忍 达英骏 冯秋红 林荣森



四川大学出版社

● 青少年哲学丛书 ●

世界哲学史话

西学东渐——东方近代思想史话

万 方 主编

四川大学出版社

(川)新登字 014 号

责任编辑:唐远镜

责任印制:李 平

世界哲学史话

万 方 主 编

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市望江路 29 号

新华书店经销 郫县犀浦印刷厂印刷

787×1092mm 32 开本 60 印张 1280 千字

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40000 册

ISBN 7-5614-1525-7/B·78 (全套 15 册)

定 价:75 元

世界哲学史话

主 编：万 方

副 主 编：宋庭亮 梅宗奇 姚仁海

撰 稿：方国荣 土 水 汪小洋 许 望
吉良玉 达英骏 冯秋红 林荣森
福田忍

卷 目：

童年游戏——神秘的原始思维

天人感应——中国神话中的哲理

万物有灵——外国神话中的哲理

易变无穷——易经演义

天理人道——中国古代思想史话

智慧之果——中外古代哲理故事

天国微笑——印度哲学和佛禅哲理

爱琴海神——古希腊哲学史话

上帝光环——圣经哲理故事

海洋精神——西方哲学家故事

人的解放——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

西学东渐——东方近代思想史话

科学理想——马列主义漫谈

自由人生——生活哲理故事

美是生活——艺术哲学趣谈

西洋海风上陆来

(代前言)

《世界哲学史话》是一套哲学通俗丛书，在通俗易懂的前提下，用趣味漫谈的方式阐述、介绍了人类五千年来，对世界和人类本身的认识过程。

丛书在通俗介绍世界哲学史发展大框架、介绍基本哲学原理的同时，更注意青少年读者的认识特点和阅读兴趣，将高深的哲学原理融合于古今中外的传闻轶事之中。这里有中国经典哲理故事；有古希腊、古印度、古以色列等世界各民族文化遗产中的哲理故事；有古今中外哲学家、思想家的人物故事；也有历代文学家、艺术家的艺术哲理故事；有中外经典哲学原理和命题的趣味介绍，也有古今中外寻常百姓的人生哲学故事。这些故事短小精悍，生动有趣，深入浅出，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以期同青少年朋友共同去认识世界，领略社会和人生的真谛和甘苦。

丛书除了收有著名哲学家深邃的思想与言行外，同时还适当地选择了一些唯心主义哲学家、诡辩论者的狡黠和谬误，以提高青少年的识别能力，这里特加以说明。我们

相信，青少年读者会从前人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中得到有益的启迪。

《西学东渐——东方近代思想史话》是丛书的第12卷，主要介绍了西方哲学和西方文明在近四五个世纪以来对东方的影响和东方现代文明的形成过程。

哥伦布航海探险的成功，标志着西方海洋文明向全世界拓展和世界现代文明到来的先声。

为什么郑和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宝船”舰队先于哥伦布下西洋而没有使中国成为海洋文明的先端？

如果林则徐率有“炮利船坚”的舰队，鸦片战争就能打赢吗？近代中国为什么落后于西方？

“日本”是“中国”的学生，为什么学生能超过先生？

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打败了为什么今天又能崛起？

我们要“东方的”还是“西方的”？还是“世界的”？

看了本书，只要你多问几个“为什么？”，多打几个问号，再想一想，就能从这些发人深醒的问题中找到近代中国之所以落后挨打的根本原因，并从中得到鞭策和启发，为振兴中华而发奋努力——不仅仅是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更重要的是在继承华夏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学一点海的气派，海的精神，并将之“融合”，使之成为世界的精神，全人类的精神。

编 者

目 录

西洋海风上陆来（代前言）	（ 1 ）
徐光启引进西方科技	（ 1 ）
利玛窦传教中国	（ 8 ）
世界地图和“世界中心”	（ 16 ）
哥伦布对近代中国的影响	（ 20 ）
西洋海风催中华	（ 24 ）
为什么郑和不是“中国哥伦布”？	（ 28 ）
打开地图看世界	（ 34 ）
魏源和《海国图志》	（ 37 ）
王韬对普法战争的介绍	（ 42 ）
走出“中国”的环球行	（ 47 ）
光绪帝百日维新	（ 52 ）
日本“明治维新”之后	（ 58 ）
“东洋道德，西洋技术”	（ 64 ）
日本的世界市场思想	（ 70 ）
日本的“制度开国”观	（ 75 ）

孙中山和旧民主主义·····	(78)
新文化运动·····	(86)
五四爱国运动·····	(90)
胡适和“全盘西化论”·····	(96)
东亚的“儒家仁爱精神”·····	(102)
朝鲜启蒙主义思潮·····	(106)
东亚的后儒家时代·····	(111)
“儒家资本主义”的新加坡·····	(117)

徐光启引进西方科技

徐光启是我国最早介绍西方自然科学，用来发展我国的农业、水利、天文、数学等科学技术，作出相当大贡献的人。

徐光启(1562—1633)，字子光，号玄扈，于明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四月二十四日生于上海一个被倭寇(日本海盗)抢劫、焚毁破产的小商人家庭里。由于家仇国恨，还在童年时代，他的姐姐和父母亲就常给他讲述倭寇侵扰家乡的情景，从而启迪了他的爱国之心。

徐光启中了进士之后，先在翰林院、詹事府和礼部任职，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以后，先后升任礼部左侍郎、尚书、内阁大学士，初上仕途的徐光启踌躇满志，准备在政治上大有一番作为。

徐光启生活的时期，正是明王朝急剧崩溃的前夕。在崇祯年间，由于朝政腐败，连年发生水、旱、虫等严重自然灾害，使国内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十分尖锐，一方面清兵不断侵扰长城内外，另一方面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矛头直指明王朝。这时西方殖民主义者和倭寇也乘机掠劫骚扰

我国沿海地区，使广大人民蒙受更大的苦难。徐光启的先世遭受过倭寇的抢掠，本人也尝到过灾荒挨饿的滋味，因此，他对国家大事和农业生产非常关心。嘉靖三十二年（公元 1553 年），葡萄牙殖民者侵入我国领土澳门。万历年间（公元 17 世纪初），荷兰、西班牙殖民者侵入我国台湾。徐光启主张发动民众进行武装抵抗，表现出强烈的爱国思想。徐光启积极鼓吹发展农业生产。他极力赞扬李悝、商鞅等古人的“农本”思想，主张“富国必以本业，强国必以正兵”，呼吁“平安不可忘战”。他多次上书，提出了许多改良生产工具，改良耕作方法和高产作物等发展农业生产的有效措施，把我国传统的农业科学向前推进了一步。徐光启是一个主张革新的地主阶级政治家。“富国强兵”可以说是他毕生的愿望和奋斗的目标。

公元 16、17 世纪，西欧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比较快，科学技术也进入了一个迅速发展的时期，在物理、数学、天文学等学科都以得了许多重大成就。这时，许多传教士纷纷来华传教，把西欧的科学技术也带到了中国。

徐光启在 42 岁之前，为了猎取功名，耗费了不少精力。但和一般士大夫不同的是，他在咀嚼诗书的时候，还大量阅读科技书籍。1600 年，他在南京结识了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这位传教士带来了三棱镜、自鸣钟、日晷仪、《万国舆地图》等东西，引起了他对自然科学的浓厚兴趣。从那时起，他的思想中就萌发了借翻译西洋科学书籍来提高我国科技水平的热望。待中进士入翰林院之后，

他除了认真攻读财务政策外，又热诚地向利玛窦学习科学知识，并多次提出合译西洋科学书籍的要求。

一个与利玛窦同时代的耶稣教士曾说过，“天主不是数千年来常用一样的方法引人归向自己的。所以如果本会同志们利用这种鱼饵来引鱼入网，也就不该视为足怪。因为凡是主张在这个教会中摈斥算学、物理学和伦理哲学的人没有充分认识中国人精神上的烦闷，要不是用这种劝诱的方法来维系人心，什么救灵要药是不能使他们领受的。”利玛窦正是这样一个以介绍科学知识作为传教手段的牧师。本来，他早已窥测到中国帝王看重历法，常把历法与政治“运数”联系起来，所以想通过先译天文历法书来打入宫廷内部。但徐光启却认为“算术者，工入斧斤寻尺”，坚持从利国利民出发，先译数学方面的书籍。由于徐光启的一再敦促，利玛窦才勉强答应先译《几何原本》一书。

《几何原本》共 15 卷，是公元前 3 世纪亚历山大的伟大数学家欧几里得所著。内容是按照公理方法建立起来的比较完整的几何体系，是欧洲流行最广的数学名著。徐光启深为该书所吸引，决心翻译介绍过来。从万历三十四年（公元 1606 年）秋到第二年五月，他和利玛窦合作翻译了前 6 卷，由于利玛窦不愿再译没有译完。后来直到清咸丰二年（公元 1852 年），才由清朝数学家李善兰和英人威烈亚力续译了后 9 卷，这已是 250 年之后发生的事了。

翻译此书，利玛窦口授是不成问题的，因为该书他早已学过，而徐光启笔译则是一种非常艰苦的劳动。文笔流

畅且不说，特别是一些专业名词的翻译，在意思准确的前提下，还得斟酌古今，使人看了易于领会。但值得庆幸的是，徐光启是个求知欲极强和意志非常坚定的人，仅用两年功夫，就把这部著作啃下来了。他的翻译是相当成功的，近代大文豪梁启超说是“字字精金美玉，是千古不朽之作”。这部不朽之作的问世，不仅解决了当时社会的需要，也为清代的数学研究奠定了基础，而且使我国古代数学在原有的基础上获得了发展和提高的新条件。这在学术上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徐光启所创立的一套名词术语，有很多至今仍为我国数学界沿用，如人们熟知的点、线、面、直角、四边形、多边形、平行线、对角线、相似、外切等等。“几何”二字在汉语中本来只是个虚词，经徐光启利用，以后就成了一个专业名词了。这是徐光启对我国数学发展的又一功绩。

为了进一步沟通中西科学技术，继《几何原本》之后，他又和李之藻、熊三拔等合译了《同文算指》、《泰西水法》、《测量法义》等书。在《测量异同》和《勾股义》中，他把中西测量方法和数学方法进行了一些比较，并且运用《几何原本》中的定理把我国古代已有的证明方法严密化，还创造了一些新的证明系统。他的这些开拓性工作，既得到一些开明人士的支持和赞扬，同时也遭到守旧士大夫的讥讽和诽谤。但徐光启始终坚信：“百年之后，必人人习之。”

对于科学，徐光启的进取心是不会衰竭的，直至生命

的最后几年，他还活跃于科学领域。

在垂暮之年，他攻克的目标是大统历。他以为这是一个可以展其所学的好场所。因为当时使用的是明初编制的大统历，除个别地方外，全部承袭元朝郭守敬等人编撰的授时历。授时历是很精密的历法。但是我国古代历法包括推算日食、月食等许多内容，不同于西方历法。到了明末，授时历实际上已经使用了将近350年，误差累积，推算日月食已经不准确。在这期间，虽然多次有人提议改革历法，但都没有被采纳。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五月日食，钦天监推算又发生错误。崇祯发怒要治负责此事的五官灵台郎的罪。徐光启上疏说：“五官灵台郎观测天象，依据的是元代郭守敬的办法。元朝时使用此法，就曾有推算应发生日食而实际无日食的事，郭守敬尚且如此，难怪五官灵台郎会推算失误。我听说历法使用久了必然会产生误差，应该及时加以修改订正。”崇祯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下诏让西洋人龙华民、邓玉涵、罗雅谷等推算历法，徐光启任监督。

徐光启在主持修订历法的过程中，表现出唯物主义思想和观点，他认为，任何空间、时间都没有不发展变化的，而且日月五星的运转是有一定规律的。他批评了那种推算不合，或“归咎于天”，或妄言“数有神理”的迷信错误思想。他统计了明朝以前历史上记载的596次日食时间和计算时间的误差，得出结论说：“汉以前差以日计，唐以前差以時計，宋元以来差以刻计，”以发展的观点说明

历法是不不断进步的。因此，他主张在弄清天体运行规律的基础上，制订新的历法。

鉴于我国古代历书亡佚很多，当时很少有人能透彻了解我国传统方法的优劣根源，而西方天文学有比较严密的数学基础，的确有比大统历进步的地方，并且又实地核验过，推算交食也比较准确，徐光启决心采用西法改革历法。他的改历计划是：集中力量翻译编辑欧洲天文书籍，提出“叙述既多，宜循节次；事绪尤纷，宜先基本”的编译方针；同时，安排制作观测仪器和观测的计划，以获得修历的基本数据，并且验证西法的正误。他的意图是：“熔彼方之材质，入大统之型模”，制订出“会通”中西，“超胜”西方的历法，达到“上推远古，下验将来，必期一一无爽，日月无食，五星凌犯、必期事事密合”的高水平。但是，由于财政拮据，人员缺乏，加以徐光启本人一度投入反击清兵保卫京师的战斗，并且于崇祯五年（公元1632年）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参与军机，繁忙的军事政务，使他只能利用业余时间从事改历工作，因此他的修历计划不得不有所缩减。尽管这样，在4年的时间里，他仍然完成了130多卷的历法编译工作，因为编纂在崇祯年间，取名《崇祯历书》。徐光启审改过大部分草稿。在一封奏疏中，他曾经谈到当时工作的一些情况：“讨论润色，原拟多用人员，今止臣一人，每卷必须七八易稿。”为《农政全书》作序的张溥也作述道：“予在长安，亲见公推算纬度，昧爽细书，定夜半乃罢。”这都说明徐光启

工作的谨慎和辛苦。

在督领修历期间，他仍和当年搞农学试验一样，坚持自己动手，在拟定计划，物色人才，设置仪器等方面花费了很大力气。他曾说：“千闻不如一见，未经目击而以口吞争，以书教，虽唇焦笔秃，无益也。”所以，他虽已 70 高龄，但每次月食时总和其他人一起守候在观象台上，以观测验证新法的计算结果。有一次，不慎失足跌倒台上，伤了腰膝，以致“不能动履”，但是仍然坚持观测。为了观测的需要，他在中国第一个为观测天象配制了望远镜（“窥筒眼镜”）。

徐光启的天文工作，奠定了我国以后 300 多年的历法工作的基础。他把欧洲天文学介绍引入我国，使我国传统天文学开始吸收了一些先进的东西，其中有比我国原有的计算公式更简捷精确的球面三角法，以及“地球”、“地球经纬度”、“时差”、“蒙气差”等概念和更先进的度量制度，如把圆周分成 360° 、一天分成 96 刻等。这些西方科学知识和吸收使我们国家的科学技术工作开始进入中西结合的阶段。

利玛窦传教中国

利玛窦作为最早正式介绍西方宗教与学术思想的奠基人，在中国度过了他的后半生，并且死后葬在中国。他对发展中国和欧洲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产生了历史性的影响。然而作为一名传教士，他在传播西方文化时必然会有某些局限性与神学因素。在资本主义萌芽遍及江南的时候，利玛窦已不可能取得像佛学在中国那样的成功，也使得他们的传教活动历尽波折，对中国宗教的影响微乎其微。但是在传播西方科技文明方面却起了巨大的作用。

利玛窦于1552年10月6日出生于意大利中部教皇邦安柯那省的马塞拉塔城，于1561年入本城的耶稣会学校学习。他在16岁时奉父命到罗马学习法律。在罗马浓厚的宗教气氛影响下，1571年他在罗马加入了耶稣会，并且继续在耶稣会主办的学校学习哲学和神学。在此期间，他从当时著名的数学家那里学习了许多科学知识，这对利玛窦后来在中国传教产生了重大影响，并以此在中国站稳了脚跟。

1557年，利玛窦怀着虔诚之心，自愿赴东亚传教，

参加了耶稣会派往印度传教的教团。在葡萄牙候船期间，他又进入高因盘利大学学习，这所大学是耶稣会训练东方传教团的一个学术中心，后来耶稣会在中国的重要译书，就是这个大学的教本。

1578年3月24日，他从里斯本乘船往东，于同年9月13日到达葡萄牙在东方殖民地活动的重要据点印度的果阿。在果阿居留4年后，1582年4月他自果阿启行，同年8月抵达澳门；从此，他便在中国传教、工作和生活，足迹从澳门和肇庆到韶州、南昌和南京，又从南京到北京。他于1610年5月11日在北京去世，经朝廷恩准，葬于北京阜城门外二里沟。

利玛窦终身为耶稣会工作，其中28年在中国传教，可以说利玛窦的一生是传教的一生。

中国和欧洲在古代和中世纪很少有直接交往，所以彼此也没有什么直接的认识。欧洲人自古以来虽然知道东方有个“丝绸之国”，但完全不清楚它究竟是个什么样子，更不知道它就是东方的文明古国——中国。随着成吉思汗骁勇的蒙古铁骑像潮水一样涌向多瑙河畔，东西之间的交往逐步扩大。13世纪以后，欧洲的传教士和商人开始陆续到达中国，其中最著名的首推威尼斯人马可波罗，他的《马可·波罗游记》震动了欧洲，使欧洲人知道东方有一个强大的鞑靼君王，统治着一个土地广阔、民物繁庶的大国。继马可波罗之后，另一意大利传教士鄂多立克也来到中国，证实了这个大国的存在，他在游记中对中国城市的